



“我行我素”的德国制造业



【财新网】（作者 戴维·奥德兹 埃里克·莱曼）制造业使美国富裕、发达；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中击退以农耕为基础的南方顽固叛军；催生了 20 世纪所有最伟大的城市。大卫的爷爷（Don Lochbiler）成年后很长时间都在《底特律新闻报》当记者。退休后他出版的唯一作品《与底特律共舞》，赞美一个傲然向全球运送产品的世界级汽车行业的诞生，同时也歌颂最繁荣富裕的一代名城底特律。《底特律新闻报》编辑马丁·海登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在美国的城市史上，恐怕没有哪座城市，可比拟底特律从密歇根州和五大湖商业区的一个地方枢纽，进化成为 1973 年以工业化大生产发源地誉满天下的庞然巨物。”

制造业意味着经济成功。IBM 科学技术部前副总裁拉尔夫·戈莫里郑重指出，“制造业一度被公认为是美国杰出实力和经济繁荣的基础。”

然而岁月无居。1950 年，超过 1600 万美国人在制造业就业。制造业就业岗位扶摇直上，1978 年达到峰值 1900 万左右，然后开始跌落。今天，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约 1 200 万。同期制造业就业比例从 1/3 下降到低于 1/10。

随之而起的一个反应，即承认制造业大幅下滑在所难免但无关紧要。金融界专刊《福布斯》一篇题为《制造业为什么不重要》的文章解释说：

“我们非常清楚促成工业时代经济成功的种种因素——获取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资本、机械，以及（很多情况下）一个好点子。现在，所有这些传统优势日渐消退，除了好点子。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返，我们即将进入

创新经济时代，制造业将成为某种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财产，将胜过一切。”

可是并非每个人都不担心。已有学者、思想领袖和政策制定者表示非常关注制造业的衰落，以及尾随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受到的侵蚀。去底特律、克利夫兰或印第安纳州加里走一遭，就能了解当制造业消失又几乎找不到东西代替时，呈现的是什么状况。

这不只发生在美国。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曾宣告：“当我们停止建造火车、飞机、汽车和船舶”，法国将不再是伟大的国度。他的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制造业就业比例自 1970 年起已经减半，从 28% 降至不足 14%。法国的遭遇，影射了席卷整个欧洲以及其他 OECD 成员的制造业就业流失。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日报之一《卫报》有文章提出疑问，“为什么英国不再制造”？并警告“在过去 30 年里，英国的制造业缩水了 2/3，堪称所有大国中最严重的去工业化，并冠冕堂皇谓之经济现代化——可是能用什么取代它”？

然而德国照样我行我素。制造业继续为该国提供重要的经济后盾。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政策董事会前主席查尔斯·维斯纳指出：“2008 年金融危机令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危如累卵。可德国，尤其是它的制造业，却表现优异。”数据支持了维斯纳的说法：当美国制造业占其 GDP 比例仅为 13%、英国仅为 12% 时，德国制造业占 GDP 比例竟高出近一倍，达到 21%。

维斯纳解释道：“在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屈服于亚洲竞争时，德国扩大了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他继而忖度：“德国是怎么做到的？一个高度管制、拥有强势货币的高薪国，到底如何迎战亚洲低成本对手并增加了自己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事实上不只他在苦思冥想，很多发达国家都想知道如何以及为何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德国制造”依然反响巨大。本章的目的，正是解释为什么今时今日，德国制造仍旧举足轻重，还有同样重要的，为什么这也是德国经济韧性的秘密之一。

德国特性

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落大体被归因于全球化，特别是亚洲低成本竞争的出现。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解读了全球化进程触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制造业下滑的经过。弗里德曼指出，亚洲和东中欧国家之前都被撇在一边，不能参与 OECD 成员国之间发展的大型交易与经济一体化。而正是贸易开放和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大幅促进了二战后西方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惊人经济增长。

柏林墙的倒塌掀起巨变。随着东欧地区和中、印两个巨型国家的开放，比较优势结构从根本上被撼动。与这些国家发展贸易、创办工厂、开放设施、获得早先难以企及的低成本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统统变为可能。弗里德曼举出不少精彩实例，讲解了高成本发达国家投向这些低成本的世界经济新进入者的各种离岸外包生产。

然而，美国制造业的困境明显开始得更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即

柏林墙倒塌的十年前，美国制造业危机便已初露端倪。当时日本和欧洲从二战的瓦砾中复苏，逐渐恢复了制造能力，美国低成本汽车和钢铁进口戏剧性激增，导致国内生产和就业遭到破坏，并终于殃及以制造业为主的中西部城市的产品生存能力：从亚克朗的轮胎、匹兹堡和加里的钢铁到底特律的汽车。最后，许多依赖供应商的小社区也劫数难逃。一时间，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飙升。

经济学家、思想领袖和决策者给这场经济灾难打上“竞争力危机”的烙印。美国制造业公司根本无法抗衡这些更高效的海外竞争对手，它们背后有战后建立的先进工厂，还能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

因此，美国制造业步入长期下滑的趋势。英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和美国一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的十年里，英国的制造业活动逐渐衰落。《卫报》曾有回忆，“撒切尔夫人上台时，制造业占英国国民收入的近 30%，就业人数 680 万。等到 2010 年 5 月布朗离开唐宁街，制造业占比已经降至仅略高于 11%，就业人数 250 万。”

然而就像在美国，制造业凋零不能怪罪到哪个政党头上。预兆也许早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治下便已显现，只不过就算政权更迭，问题仍旧升温。“直到托尼·布莱尔执政，关于由工业转向服务业的极其必要的争论，才升华为对英国世界地位更乐观的憧憬。新工党的建筑师们坚信，未来会是他们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曼德尔森宣称硅谷令他‘灵感泉涌’；布朗则发誓三年内让英国成为世界电子商务大本营。”

《卫报》解释说，这一经济战略紧绕的重心是放弃制造业，从事无法轻易离岸外包的经济活动（比如知识和服务）：“主题仍然简单至极，大部分可以制造的东西可以在其他地方更便宜地制造。未来贵在拿出想法、软件和最重要的品牌。英国人曾经向世界出售汽车、船只；现在大家可以推销文化、旅游和劳拉·克劳馥。”

法国的制造业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如《明镜周刊》报道：“萨科齐无法阻止法国工厂的破产。1980—2010 年，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减少半数以上。”但是周刊又指出：“这并非事态发展的必然，看看近旁的德国，那里的大众、戴姆勒、宝马等企业就雇用了比 30 年前还多的员工。”

为什么德国能够承受困扰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双重症状——外包与离岸——进而保持了竞争力？答案和中国的币值低估绝无雷同。几乎从 2001 年发行时开始，欧元的价值便一直相对高于美元等其他主要货币。不管怎样，德国、法国以及欧元区所有其他国家握持的是相同货币；可不知为何，制造业在德国偏能顽强发展，而在许多周边国家，它却衰颓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准确地说，不少政策和体制帮助德国企业获得了生产过程的高效要素，反过来又令投资地德国更具制造业领域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培养关键翻译协会、机构和组织；促进大学和技术院校新开发技术的应用；重点依靠政府补贴的培训和学徒计划打造一支高技术劳动大军；工人和工会愿意接受适度的工资增长以维持就业水平；精良的基础设施；各自拥有质量优势的独特中小企业集群；焕发活力、魅

力和多样性的城市，以及能够畅通无阻加入德国职场的国外高技能人才。

特别地，德国制造业实力有一个潜在的关键因素：丰富多样的研究机构，专为德国制造企业提供重要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最广为人知的当数 67 家学院构成的弗劳恩霍夫协会。另外，组成马普协会的机构也许更有名更受世界瞩目，何况一群诺贝尔奖得主正专注于基础研究或“知识本身”，以推动研究或学术学科向前发展。

对比来看，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更侧重应用研究，目标是提供有商业价值的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在基础研究和其商业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美国没有可以匹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机构——除了一小部分设在当地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最突出的例证之一是，总部设在埃朗根的弗劳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所开发出 MP3 数字音频格式，成功填补了基础研究与制造业创新产品之间的空白。该研究所发明并注册为专利的压缩算法，截至 2005 年已经赚到 1 亿欧元的授权许可收入。

曲共因需十研究所甘定社目八引公作协的部门 廿 1 2 次合市拉市白德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181

